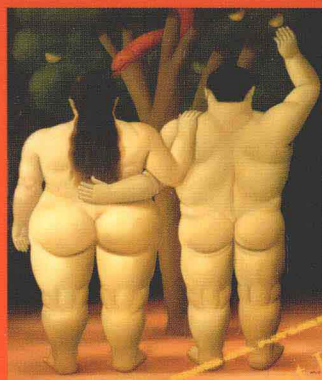




Independent Review

Word Carnival and Sensual World

文字欢场与声色天下

孙 曙 著

上海三联书店

文字欢场与声色天下

Word Carnival and Sensual World

孙 曙 著



上海三联书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文字欢场与声色天下 / 孙曙著. —上海: 上海三联书店, 2013.5

ISBN 978-7-5426-4154-0

I. ①文… II. ①孙… III. ①文化-中国-文集
IV. ①G12-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3)第 059611 号

文字欢场与声色天下

著 者 / 孙 曙

责任编辑 / 殷亚平

装帧设计 / 鲁继德

监 制 / 李 敏

责任校对 / 张大伟

出版发行 / 上海三联书店

(201199) 中国上海市都市路 4855 号 2 座 10 楼

网 址 / www.sjpc1932.com

邮购电话 / 021-24175971

印 刷 / 上海展强印刷有限公司

版 次 / 2013 年 5 月第 1 版

印 次 / 2013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 890 × 1240 1/32

字 数 / 350 千字

印 张 / 12

书 号 / ISBN 978-7-5426-4154-0/I · 695

定 价 / 38.00 元

敬启读者: 如蒙惠顾, 请向各书店或发行所订购。如有印刷质量问题, 请与印刷厂联系 021-66510725

“对语言冷漠不信,像情人间的日久麻木。能短不长,能不写就不写,像老夫妻的房事。”

这话口味重了,但确实是吾口吾心。这倒不是受说了白说和无处去说刺激多了,因而丧气,因而灰心,因而笔懒文疏。完全没有吗?好吧,我承认也有些,这个时代发篇“有所思”的文章太难了。还有对文字操持久了,渐生对语言的警惕。你要表达的文字都能呈现吗?你有没有把文字神化?文字总是趋向化约与本质主义,趋向虚拟世界的。岁月忽已晚,不惑之年,爱情、文字、生命、价值与意义的魅影渐渐剥落,相信还是相信的,坚持还是坚持的,热爱与义愤还时时在肺腑席卷在肝胆轰鸣,只是不拿来表演。当然,还有对人类制造文字等种种虚像能力的忧惧。据官方统计,2012年中国生产故事片745部,立项拍摄电视剧1040部33877集,长篇小说登记出版5300部,光这几个数据就令人感到个体的智力孤危,更何况还有网络,还有

全球。文字、影像、声音,人类每天都在创造海量文本,然后望洋兴叹。文本生产者,当然该自觉地节育了。

虽然节制,竟也攒下些文字,新世纪以来十余年的评论文章录为一集,就是本书。之所以出版,自然有敝帚自珍,有“文章是自家的好”之意,更有对其价值的自信。这自信就是做到了萨义德所说:知识分子扮演的应该是质疑,而不是顾问的角色,对于权威与传统应该存疑,甚至以怀疑的眼光看待。这价值就是对有权势的知识分子和文化实在(政策制度、类型产品)的质疑与批评。文化特别是大众文化总是造神运动,众声喧嚣中一面有乌合之众的随波逐流追捧若狂,一面有神的圣殿降下莲花与雷霆。本书所评所论,皆为新世纪以降文化热点人物、事件及作品,有尽可能宽阔纵深的文化视界,从文学、影视、传媒、音乐、戏剧到教育、哲学、语言、青年亚文化,解读这个时代缠密的文化文本与文化权力的生产、技术,解读余秋雨、易中天、莫言、贾平凹、王安忆、池莉、赵汀阳、张艺谋、周星驰、韩寒、《读书》、语文教材、普通话、时尚画报、屌丝、中国好声音等等神的谱系。因为反对简单化约,所以文中尽可能消除捧与骂,而有尽可能丰富的文化切片、尽可能多极的视点、尽可能深长的历史轨迹、尽可能新鲜的启悟,以期赓扬人文传统和独立批评。萨义德还说:从事批评和维持批评的立场是知识分子生命的重大方面。本书当然也是我的生命,生命在追求学术、文章、

品格、境界的活力、丰饶与独立,追求生活的无边宽广和诗意。

时代十面“霾”伏,最终自由并未到来,晦暗中魅影憧憧,时时上演三岔口式的争斗,眼前就有莫言获诺奖后挺莫倒莫的对峙,紧张够紧张的,据说造成了舆论的分裂,舆论在哪儿分哪儿裂啦?声嘶力竭剑拔弩张成了表演。暗夜星点,自由之路更为幽邃崎岖。卡夫卡说:“我们只该去读那些会咬啮、刺痛我们心灵的书。书如果不能让人有棒喝般的震撼,何必浪费时间去读它。”

2013年1月31日

序 1

第一辑 文字欢场 1

余秋雨《借我一生》，新时期思想文化的意外终结 2

天象·俗情·经典——《天香》及王安忆之魅 16

莫言与诺贝尔的文字欢场 30

苍老的脐带：贾平凹的修辞与乡愁 49

雌性社会的诞生——《她的城》与池莉的创世纪 68

狰狞的乡土——“温家窑”细端详 86

牧神的午后：“他们”的小说姿态 105

纸上知识分子——王尧《脱去文化的外套》发覆 113

异端的成立：“后中国”症候之丁成篇 125

书评，在思想与学术间摇摆——以《读书》为例 166

文体的战争与和平 178

赵汀阳之局：世界，抑或天下 188

第二辑 声色天下	207
肉身沉重的“公知”:新世纪传媒红人易中天	208
逢时异己的独唱:屌丝领导者韩寒	227
铜版纸帝国的这些事:身体的生产、性和主义	249
原罪还是替罪羊——民国教材热卖背后的罗生门	264
步入意图丛棘,丁亥大片《色,戒》《集结号》……	277
《金陵十三钗》:屠杀的搁置与暧昧的崇高	296
裸奔的影像:国家、青春、肉体、土地	309
女器清扫:MV《煎熬》的性政治和技术主义	321
声音的政治经济学:从新华广播到中国好声音	332
低矮的上海屋檐下	345
母语呼告:普通话、方言、少数民族语言平衡发展	350
恢复并保护市场化的戏曲生态	363
后记	375

第一辑 文字欢场

余秋雨《借我一生》，新时期思想文化的意外终结

古训云，玩火者自焚，嬉水者自溺。真所谓成也萧何败也萧何。渔名利于舞文弄墨，也会因此死得很难看，20 世纪及其前专制统治下的死亡模式是文字狱，21 世纪的死亡模式则是被自己狂喷的墨水淹死。余秋雨先生在其自传《借我一生》发表后，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借我一生》写完，心愿已了。等把四卷本学术文集修订完，我再也没什么遗憾了。我将闭门搁笔，彻底告别中国文化界。如若余先生此次果不食言，自决于文化界，《借我一生》便是其留赠文化界的墓志。真的，《借我一生》是余先生的死亡书，一次蹈死不顾意气慷慨的自尽。对于文化界而言，余先生的自决多少属于意外死亡。但是余先生所代表着的整个新时期思想文化界，苦心经营多年搭建成的多米诺骨牌，也因其玉碎而轰然倒塌。

加冕荆冠，用苦难当息壤遮蔽依附

《借我一生》是余先生的记忆文学，书中余先生用谱系学考察

家族，力证自己的家族是一个殉道的家族。这余家的家族谱系却是一位神秘的杭州老人的密学，私授给余先生的。《借我一生》的叙事之核是一个传说“吴石岭里藏古书”：余先生的家乡浙东余姚上林湖一带，是著名的越窑产地，在南宋末年，有一越窑窑主姓余，因上林湖而被人们称为“余上林”，他因为说了真话“襄阳城已被蒙古军包围三年”，被奸臣贾似道杀害。元灭宋前夕，余上林的儿子媳妇又为了保存“天下斯文的最后一脉”——“宫廷图书馆最珍贵的版本”，熄火毁窑，将烧窑干炭悉数运进上林湖边吴石岭中的藏书窟，以消窟中潮气。书中说“怕自己和别人失口，窑主夫妻带着那一群封洞工人远走他乡，不知所终。越窑的历史，就此中断”。这个传说，余先生讲是一位杭州老人告诉他的。杭州老人说：余上林一定是你家远祖。他儿子远走他乡，但按照我对他的理解，多少年后还一定会拖家带口地回来。何况他妻子朱夫人的娘家，也在这一带。杭州老人问余先生：你妈妈姓什么？姓朱，余先生说。杭州老人笑了。

看到此处，读者也笑了。杭州老人硬是完成了将传说与现实牵线搭桥的艰巨任务。“吴石岭里藏古书”的传说相当于话本小说中的入话，是全书情节的母本，模子，也是全书构建的象征。南宋余上林父子为了讲真话为了保文化舍命毁家，书中叙述的余先生及其父亲的遭遇正与之对应。杭州老人拎着读者的眼皮对着读者的耳朵嚷，“吴石岭里藏古书”是作者要读者一定要看懂的隐喻，为斯文一脉为求真一途而殉道，是余氏家族代代相传的荆冠，

余氏一族天生文化苦旅的自觉与宿命。磨难与光荣是《借我一生》贯穿始终的主题，死拽住主人公走上祭坛，加冕荆冠，神圣起来。

历经千年轮回，这个神圣家族的现代起点依然是光荣的，余先生的祖母虽然无名，但姓毛。余先生书中交代，近来有历史学家考证，毛泽东主席的祖辈也是从浙东到湖南去的，与蒋介石先生的原配夫人、蒋经国先生的母亲毛福梅女士属于同宗，而“我的祖母显然出自浙东毛家”。余先生接着说“是否与谁同宗，也不细想了”，但还用得着细想吗？这切切实实地已连上宗了，比刘姥姥攀得巴实。在余先生的人生炼狱的入口，正是《〈红楼梦〉后传》的开篇。余先生祖母和外祖父的父亲，“都是19世纪后期的勇敢闯荡者，由浙东农民成了真正意义上的上海人”。尤其是朱家，“朱家可算一个豪门，外公的父亲朱乾利先生由浙东一个放牛娃而成了上海巨富。我曾经见过一本印制考究的纪念图集，沈钧儒先生题词评价他是商界泰斗”。但只到了余先生祖母和外公这一辈就败落了。余先生的祖父是上海一家著名的民族企业的高级职员，很早就过世了，留下七个孩子靠祖母养活。外公只知书画棋酒，虽然分家得了一些企业，却不会经商，到土改时只剩下十八坛黄酒。家世的富贵在笑贫不笑娼的今天足足以摆谱的。而其败落，正是天降大任，斯文一脉可以保全发扬了。在余上林及其子媳的传说中，就包含了这个契机。也正是这个传说，将商人出身的铜臭用舍身取义疏财救文洗刷殆尽。传统的商贾之俗与文

士之雅的二元对立,在这个传说里统一了。

这样,余家的故事又回到了吴石岭,回到了斯文一脉。文化的自觉或者说文化人的自觉开始行动了。余先生的母亲“是全村唯一有文化的人。因此无论白天、夜晚,她都要给全村乡亲读信、写信、记账、算账”,余母后又在村里办识字班,做了村里的会计,俨然一位文化祭司,掌握了全村的文化命脉。在余先生8岁时,其母将记工分算账写信读信的事务传给了他。从此“每天夜晚那些村民热切的目光依然穿过腾腾烟雾落到小油灯前,灯光映照着的已不是那位年轻妇女,而是她的儿子”。其祖与上林湖共名,其裔也与吴石岭共责,吴石岭藏书隐喻,很自然地给这位余姓天才少年,打上斯文一脉传承者的追光。文化苦旅起程了。

在所有对余先生其人其文的品评中,称其为“‘文革’余孽”是最具杀伤力的。《借我一生》对此作了回应,书中确实实地给我们呈现了余先生一家在“文革”中的苦难。余先生的叔叔因为“吹捧《红楼梦》”被人揭发,被批斗游街,自杀身亡。余先生的父亲被打倒,关押,想过自杀。在沦为贱民的同时,全家八口人的生活费每月只有二十六元,在极度饥饿的边缘挣扎,奄奄一息。余先生日后的妻子马兰的父亲是老右派,父母都遭到批斗。所有的苦难在今天都是光荣。而余先生本人叙述自己的“文革”经历是:运动初期,“我所在的戏剧文学系三年级整个班级都与造反派彻底对立,被造反派们称为‘对抗文化大革命的反动堡垒’。而我则是这个反动堡垒的代表者”;造反派掌权后,受到排挤,“我产生一

种英雄气概……干脆仿效起明末遗民，把一身弱骨强撑成一身傲骨，把一脸茫然装扮成一脸冷然”；经人推荐，参加江青提出姚文元授意组织的“批判斯坦尼斯拉夫斯基”写作小组，写了一篇学术论文《关于从自我出发》，未被采用；下乡劳动，在苏州吴江解放军农场围湖垦田，“以苦为乐，率性大干”，被选为副排长，“这是在农场接受改造的大学生所能担任的最高职务了”；分配留校，挖防空洞，反复推脱不得，加入《鲁迅传》写作组，写作鲁迅在广州这一段，在“不向我讲清全部危险背景”的情况下，被推到《朝霞》编辑部，抵挡扬言踏平编辑部的当权的工总司；生了肝炎，写作一篇考证鲁迅佚文真伪的文章，“在极左风声又一次突紧之时，逃离上海”。书中叙述的事件，可以看出两条线：个人命运被政治主宰不由自主，沉浮之中依然坚持文化道义守护文化防线开展学术工作。《借我一生》出版后，《南方周末》对余先生作了专访，对相关人也作了求证，余先生依然认为自己在“文革”中没有污点。相关人员的回忆则证实，余先生从1973年起被正式调入上海市写作组文艺组，写作并发表了《读一篇新发现的鲁迅佚文》、《读〈朝霞〉一年》、《胡适传（五四前后）》，修改定稿并发表了《走出‘彼得堡’》、《封建礼教与贾政》；不止一次一处地在诸如“评法批儒”的大批判中作报告，批评上戏的台词教材低俗，上纲上线，导致许多人挨批；“文革”后属于“说清楚对象”，经过三年清查被定为“说错话，做错事，写错文章”一类。两方面的材料并不像双方的观点那么对立。余先生“通达人性”、“带有艺术素质的记忆”，相关人

员指证其“文革”表现有问题的记忆,都是真实的。任何真实的简单枚举是真实的,但不全面,不是全部事实,材料越全面越接近真实。那么结论呢?

也讲一个民间传说,萧诗美所著《毛泽东谋略》一书中,提到在50年代的上海,广泛流传着这样一则故事:毛泽东会见资本家后,召见刘少奇和周恩来,问他们怎样才能让猫吃辣椒?刘少奇说:“这还不容易?你让人抓住猫,把辣椒塞进它嘴里,然后用筷子捅下去。”毛泽东很不满意地摆了摆手,说:“决不能用暴力,每件事应该是自觉自愿的。”周恩来说:“我首先让猫饿三天,然后,把辣椒裹在一片肉里,如果猫非常饿的话,就会囫圇吞枣般地吞下去。”毛泽东也不同意,他讲不能用欺骗手段愚弄人。其实这很容易,他说,你可以把辣椒擦在猫的屁股上,当它感到火辣辣的时候,它就会自己去舔掉辣椒,还能因为这样做而感到高兴不已。反对——依附——病隐,是余先生在“文革”中的轨迹。“文革”之初,余先生是反对“文革”的,并没有一以贯之,深入下去坚持斗争如遇罗克张志新,他那时还没有这样的认识高度,书中对此倒没有拔高。专制体制下朝不保夕的莫名惊恐驱遣着人们,余先生是做不得自己主的猫,苦难鞭打着人们,人们与苦难媾和,有的还成了嗜痂者。猫舔辣椒的主动性,也就是余先生在“文革”中种种“主旋律”文化工作的主动性。余先生父辈的灾难给他的压力,和成为异己分子被打倒的噩梦追逐着他,《朝霞》风波中作为保帅而丢的卒差点粉身碎骨,知道真相后,余先生这样想“我在这一事件

中极有可能成为牺牲品,这些人到时候连自己也保不住,对我当然弃之如草芥,谁也不会来帮助我。但我,恰恰又连带着至今还背负一系列罪名的爸爸,后果必然十分严重。已经挣扎了多年的全家,还怎么活?”政治的凶险突然跳到他眼前,这一次被抛出差点摔死的经历对余先生的影响极大,果然他生病了,病得适宜,肝炎,“可能”是父亲传染的。肝炎传染性极强,需隔离治疗,余先生的身体让他对外隔离,生理的疾病未尝不是心理的选择。而他要求到北京去休息,本安排住在《红旗》杂志社招待所,上级先赞同后又不同意其去北京。对于余先生来说这又是一个危险的政治信号。所以他应是心灰意冷地到奉化山居读书清养。回忆此际,余先生的用语是“从乱七八糟、无情无义的世界中”出逃。应该还有文化良知的因素,当事人回忆,此前余先生当时的上级对他有个评价“他现在是这里的一号种子选手。但是情绪不稳定,忽高忽低”。情绪不稳定忽高忽低应是余先生“文革”中心理的真实写照,一方面因素应该是政治高压下的人人自危的惊恐,对上级是否信任自己的狐疑,一方面应该是文化良知的阻梗。山居期间“正是这个时期,外面发生了一系列激烈的政治斗争。在周恩来去世、邓小平下台、毛泽东病重的情况下,‘文化大革命’的‘大轴子戏’,正以特别怪异和凶险的方式一幕幕展开。所幸我在山间,什么也看不到”,可要是余先生不但看到了,而且置身其中呢?也许余先生不知道他此时已被指定为上戏党委委员,还准备提拔他为党委副书记。如果“文革”还在继续,他会像日后辞去上戏院长

一样弃如敝履地辞去这些职务吗？其实，又有几人经得起这样的追问。恰如《十万进士》中余先生所说：“科举制度使多数中国读书人成了政治和文化之间的骑墙派，两头都有瓜葛，两头都有期许，但两头都不着实，两头都难落地。……文人耶？官吏耶？均无以定位，都无所谓政治品格，也无所谓文化良知”。政治集权与文化良知的冲突，专制对人格的摧残挤压，心路历程的艰难挣扎本应是本书最深沉处，最人性处，可惜被回避了。

但我们真的为余先生幸运，幸运的是余先生下山时，“文革”已结束了。真是幸运。现在余先生的“文革”回忆可以只有苦难与学术。除了绕口令事件“误伤”人，在《红旗》、《人民日报》、《学习与批判》发表的学术性文章，余先生在“文革”中没有伤害任何人，没有做任何坏事。称其为“上海‘文革’的一盏明灯”“‘文革’余孽”，如当事人所言这段被说得太夸张太重了。那么该怎么评说这一段呢？仅抄录余先生在著作中对革命样板戏团主要演员的评价作答：“我作为一名戏剧作者，当然很清楚在那场政治灾难中即便是得宠的演员也只是工具，本人没有选择的自由，因此也不必承担什么政治责任。但是，近几年看到他们之中一些人一再在电视访问中把自己说成是受尽委屈的艺术家，又觉得过分了。戏曲演员可以不懂宏观政治，却不可以没有最起码的同情心。在你们这小小一拨人享尽人间尊荣、出入如同国宾的十年间，不必说全国人民，只说你们所知道的全国数十万同行在哪里？在干什么？当九州大地没有一个角落不响彻你们演唱声的漫长岁月，他